

文雅的疯狂丛书

为了书籍的人

坚忍与刚毅之一

Patience & Fortitude:

A Roving Chronicle of Book People,
Book Places, and Book Culture

[美] 尼古拉斯·A. 巴斯贝恩 著
杨传纬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了书籍的人

坚忍与刚毅之一

[美] 尼古拉斯·A. 巴斯贝恩 著
杨传纬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了书籍的人 / (美) 巴斯贝恩 (Basbanes, N. A.)

著; 杨传纬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文雅的疯狂丛书, 坚忍与刚毅; 1)

ISBN 978-7-208-09695-0

I. ①为… II. ①巴… ②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1037 号

策划编辑 周 运

责任编辑 马晓玲

装帧设计 蔡立国



世纪文景

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

[美] 尼古拉斯·A. 巴斯贝恩 著

杨传纬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75,000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695-0/1·851

定 价 35.00元

目录

致谢 001

序言 007

第一部分 序曲 015

第一章 永恒的生命 017

第二章 幸运 064

第二部分 爱书之人 119

第三章 从疯狂中返回 121

第四章 辉煌的不合时宜 153

第五章 爱书人群像 184

第六章 猎人和采集人 220

第七章 许多年 273

注释 291

译名对照表 311

编后记 332

致谢

写作本书的初步研究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五年。我感谢曾给予我帮助的各位人士，他们不吝惜花费许多时间给予我指教；他们的远见卓识激活了本书的篇章。我很遗憾未能使用他们慷慨提供的全部材料，但是他们让我分享了知识，使我获得巨大的教益。我感谢他们为本书作出了贡献。

ix

我同样铭记着许多图书馆、博物馆的管理人、领导人和档案负责人。我去访问时，他们都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专业知识。他们是富有敬业精神的群体。我赞美他们对图书、对广大读者所做的服务工作。

应该特别提到哈佛大学的卡彭特 (Kenneth E. Carpenter)，史密斯学院的安东奈提 (Martin Antonetti)，贝茨学院的埃利森 (Robert W. Allison)，牛津大学的斯皮克博士 (Dr. Graham Speake)，欧柏林学院的英格利希 (Ray English)，伦敦图书馆的贝尔 (Alan Bell)，普林斯顿大学的伊梅尔 (Andrea Immel)，书商里斯 (William S. Reese) 和施赖伯 (Fred Schreiber)。他们每一位都阅读过本书的一部分手稿，提出了建议，改进了书的内容。当然，所有的结论、意见和研究发现仍旧是我作出的。

我感谢各地图书界人士对我进行指引、提出建议、帮助我建立联系、取得研究材料；特别要提到下列各位惠赐的协助：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斯通曼 (William P. Stoneman) 和斯托达德 (Roger E. Stoddard)，

x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莱克累克 (Paul LeClerc) 和卡西奈克 (Edward J. Kasinec), 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的里德梅耶 (András Riedlemeyer) 和斯普尔 (Jeffrey B. Spurr), 波士顿萨贝尔基金会的维特维茨基 (Tania Vitvitsky), 波士顿学院的奥尼尔 (Robert K. O' Neill),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马戈利斯 (Bernard A. Margolis) 和狄博 (Katherine Dibble), 锡拉丘兹大学的斯塔姆 (David H. Stam), 国会图书馆的柯尔 (John Y. Cole), 圣十字架学院狄兰德图书馆的霍甘 (James E. Hogan) 和福克斯 (Jayne M. Fox), 克拉克大学戈达德图书馆的鲍曼 (Susan Baughman)、哈特曼 (Mary Hartman) 和瓦尔奇 (Irene Walch), 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图书馆的西尔维 (Joel Silver), 密歇根大学的戈斯林 (William A. Gosling), 大英图书馆的普罗强斯卡 (Alice Prochanska), 芝加哥大学的施雷耶 (Alice D. Schreyer), 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希顿 (Jean W. Ashton), 米德伯里学院的施奈德 (Joanne Schneider), 杜克大学的拜尔德 (Robert L. Byrd), 美国古物协会的邓拉普 (Ellen S. Dunlap), 位于夏洛特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的贝兰杰 (Terry Belanger), 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学的施瓦茨 (Charles A. Schwartz), 纽约格罗利尔俱乐部的霍尔曾贝格 (Eric Holzenberg) 和洛斯柯普 (Carol E. Rothkopf), 多伦多大学费希尔珍本图书馆的兰登 (Richard Landon), 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兰森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的奥兰姆 (Richard W. Oram),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汉夫 (Peter E. Hanff) 和布利斯 (Anthony S. Bliss), 法兰克福德意志图书馆的诺瓦克 (Kurt Nowak) 和迪特 (Erica Dieter),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格里耶 (Thierry Grillet)、迈尼安 (Yannick Maignien)、勒努 (Daniel Renoult) 和舍瓦利耶 (Alix Chevallier), 斯德哥尔摩王宫贝纳多特图书馆的德豪克 (Carola Sjögren de Hauke), 美茵兹古登堡博物馆的斯普伦格 (Kai-Michael Sprenger), 波士顿书社的约翰逊 (Trevor Joy Johnson), 大英博物馆的切特利 (Rebecca Chetley),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的格里姆斯 (Andrea Grimes),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朱维利斯 (Priscilla Juvelis), 纽约市的席勒 (Justin Schiller), 旧金山的比勒 (Walter Biller), 加州伯克

利的罗森塔尔 (Bernard M. Rosenthal) 和雷登 (Willian P. Wreden Jr), 加州波托罗谷的雷顿 (Philip D. Leighton), 纽约市的洛莉 (Judith Lowry), 马萨诸塞州北里丁的舒勒 (Steven Schuyler),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格罗斯曼 (Carol Grossman), 底特律的霍尔兹曼 (Irwin T. Holzman), 芝加哥的罗斯 (Edgar Rose)。

在首都华盛顿, 我深深感谢各国外交人士协助我到他们的国家进行研究考察旅行: 希腊大使馆的加拉尼斯 (Elias N. Galanis), 埃及大使馆的马赫穆德 (Basma Mahmoud), 西班牙大使馆的雷伊 (Carlos Rey), 土耳其大使馆的雷米西 (Sensu Remisci), 意大利大使馆的吉亚卡隆 (Michael Giacalone)。在梵蒂冈市, 我感谢美国驻罗马教廷大使馆的吉亚卡隆 (Mirella Giacalone) 帮助我安排了访问, 使一切得以顺利进行。

瓦林 (Niclas Samuel Wallin) 不知疲倦地引领我参观了瑞典著名的图书胜地, 几个月后我又步行参观了罗马, 两次的收获都非常丰富。下列人士在我访问他们的城市时都对我作了十分殷勤的接待: 萨罗尼卡市亚里士多德大学的拜占庭历史教授柯列斯 (Theodore Korres),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埃斯科巴尔 (Luis Escobar de la Serna), 雅典的斯泰库斯 (Konstantinos Sp. Staikos), 罗马的拉斯特里 (Lucy Gordon Rastelli)。

本书第二、三、四、五、六章的内容发表在《史密森学会月刊》、《文明》、《图书》以及《格罗利尔俱乐部公报》等刊物上, 小部分在形式上有所变动。我很感谢这些刊物的编辑给予我机会在他们的篇章上发展了原书的某些想法。

我深深感谢我的哥哥乔治·巴斯贝恩 (George J. Basbanes) 律师以及我多年的好友斯基安 (Evereff M. Skehan)、希金斯 (Brian A. Higgins)、布拉德伯利 (Robert Bradbury); 他们都给了我鼓励和精明的忠告。我的文学经纪人哈特利 (Glen Hartley) 和朱 (Lynn T. Chu) 多年来像岩石一样支持我的事业; 我很高兴在这件事情上再次得到他们的关注, 我给予他们高度的评价。

在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 我感谢下列各位的完美支持: 负责广告宣

传的经理贝尔恩 (Jane Beirn), 我的编辑助理西曼基 (David Semanki), 高级出版编辑科拉尔 (David Koral), 校对编辑奥特威尔 (Miranda Ottewell)。我感谢鲁西 (Elaine Luthy) 为本书做出了精确的索引。

xii 在过去十多年内, 前后共有八位编辑为我出版著作而尽力, 这是出版界习以为常的变动。最初与我合作的是霍尔特公司的皮科克 (Allen H. Peacock); 现在是哈珀·柯林斯公司的杜森 (Hugh Van Dusen), 这位专家的热情支持一向让我极为满意。我为他们的工作感到幸福。

我的父亲约翰·巴斯贝恩今年已经九十岁, 就我所知仍旧是最擅长于讲故事的人; 我母亲乔琪亚·巴斯贝恩 (Georgia Koumoutseas Basbanes) 是我工作最坚定的支持者。我感谢他们在我生活中作出了榜样, 给予了教导。我的岳父瓦伦查斯 (Louis G. Valentzas) 具有高尚、甜美、人情味的灵魂, 我对他怀着深刻的爱。

我的女儿芭芭拉 (Barbara Georgia Basbanes) 和尼科尔 (Nicole Stella Basbanes) 在我开始写作时就给了我爱和鼓舞, 这次更给了我创造性的技巧。芭芭拉帮助我把法文翻译为优美的英文; 尼科尔对于叙事有精细的感受, 对于幽默有天然的爱好的, 这都有助于让船舶平稳地航行。

对我妻子康斯坦丝 (Constance V. Basbanes) 的贡献作出恰当的赞美一向是难以做到的, 但是我仍旧要说几句心里话。她是我的“另一个自我” (alter ego), 是我的共鸣箱, 是我最有见识的评论者, 最亲密的旅伴, 最能干的研究助手; 然而最重要的, 在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上, 她是力量、公正与礼貌的楷模。为了所有这一切, 她永远享有我最深的爱和钦慕。

像所有图书馆的人员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四处巡游，为的是寻找一本书，也许是关于书目的书目。现在我的眼睛已经分辨不清自己写的东西，既然如此，我就准备死去了，就在离我出生地不很远的地方。我死后，怜悯我的人将用手把我抛过栏杆，我的坟墓将是深不可测的太空，我的遗体将坠落很多年，在我坠落引起的风中溶解、腐烂，这个过程将没有尽头。我宣布，图书馆事业是无穷尽的。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899—1986)

《巴别图书馆》

* 博尔赫斯晚年曾担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馆长。——译者注

序言

奥托·贝特曼博士 (Dr. Otto Bettmann) 滔滔不绝地谈了几小时，详细地回忆 1935 年他怎样从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狂魔爪中逃了出来，怎样在美国建立了新生活，成为现代通讯工具的一位卓越的革新者。已经到了中午，该休息一下了。这位 92 岁的传奇人物，几十年来以“图片人”著称的老者清脆地拍拍手掌，高兴地说道：“行了，你们一定饿坏了，大家吃点午饭吧。”

贝特曼博士创建了一个巨大的影像资料库，把各种照片供应给书籍设计师、杂志发行人、报纸编辑、广告代理商、电视制片人，因此获得了国际声誉。他具有多方面的兴趣，还非常擅于讲述；他写过不少书谈论各种消费品，谈起文字的伟大力量更是精彩动听。他又是技术高超的音乐家，长于演奏巴赫的作品。我们从他的书房出来时，我请求他为我和我妻子在客厅的小风琴上弹奏点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坐到琴键前，弹起了巴赫大师的一段美妙的小步舞曲。

后来，在佛罗里达州比奇菲尔德海岸离他家不远的一家海鲜餐馆，贝特曼博士又详细向我们解释了他为什么热爱巴赫（他和巴赫的家乡同在德国莱比锡）：“巴赫总是把我们带回到起点。我深信，上帝把他派遣到这个 2 世界，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一点儿秩序。贝多芬从来不做这类事情，他出发以后就飞速地进入了外层空间。巴赫可不一样，局限在自己创作的乐曲

范围之内，抓住一个主题不放，一切都在奇妙的秩序之中。”

我们坐了好一会儿享用午饭，愉快地用面包屑满足几只停在餐馆外面的桌上肆无忌惮的燕雀乞食。贝特曼博士又重新拾起刚才放下的话题：“上帝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做什么呢？他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我从巴赫写的一切里感到这种秩序。他开始一个主题，加以发展，前后音质相同，精神相同。主题向前进，上升变化为各种形式，但总是回到出发的起点。”

我与奥托·贝特曼相会，触发点是1995年10月《纽约时报》头版登载的一篇长文。新闻标题是：“影像档案被微软的亿万富翁盖茨收购”。这是微软公司董事局主席威廉·H. 盖茨三世（William H. Gates III）的又一项壮举。盖茨是华盛顿州贝尔维的私营科尔比公司所有人，这个公司进行了收购谈判，据说是一项“数百万美元的交易”。由于购买了贝特曼的档案，这个世界上主要的用来运作计算机系统的软件供应商将获得充足的原始材料，也变成电子图像的主要供应商。盖茨还会增购其他资料。到2000年，科尔比公司将掌握超过六千万张图片。

3 盖茨获得的资料中包括贝特曼档案库于1990年从国际联合通讯社和路透社购买的1150万张新闻图片。《纽约时报》的文章旁边登载了几张样品：棒球大王迪玛吉奥（Joe DiMaggio）亲吻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亮出他标志性的V字手势表示胜利，一只垂耳狗倾听RCA留声机声音的经典图片。图片将要经过扫描，转变为数字化图像，在国际互联网上供应给各方的商业客户。

在这场大买卖的激动气氛中，人们对奥托·贝特曼的关注都很有有限。他是来到美国的犹太移民，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创建这项档案了。上世纪每个时期的大事都对他的生活与世界观发生过深刻影响。《纽约时报》还在不重要的地方刊登了消息的附识，标题是“从一个观点到1600万张图像”。文章记述了世界最大的图片档案怎样从一个人的收藏中产生：“收集图片者奥托·贝特曼生于1903年，出身于莱比锡的富裕家庭。父亲是矫形外科医生，把对书籍的热爱也传给了儿子。奥托早在十二岁时就在家里的字纸篓中搜寻积累医学图表了。”

虽然这篇人物介绍写得很简短，但贝特曼博士一生的主要经历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在本书里想探讨的问题：知识的传授与保存，信息储藏方式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对阅读和印刷文字的无比尊重。贝特曼接受过历史学的陶冶，曾在柏林的普鲁士国家美术图书馆担任珍本书的保管员。他首创使用一种新发明——用 35 毫米莱卡照相机来拍摄德国国家藏品里的手稿。国家社会党掌权以后，把犹太人从重要岗位上清除下来，他就逃到美国。随身携带两大旅行袋，里面装有 25 000 张图像，许多是他自己拍摄的胶卷底片。尽管他一生中拍摄了千万张图像，但贝特曼始终坚信书籍在文明社会中占有首要地位。就我而言，《纽约时报》里最好的消息是他还健康地活着，住在佛罗里达，和过去一样头脑清楚。我们在电话里互相认识了，几周以后见面，进行了两天难忘的交谈。

“中国人有一种说法，认为一画抵千言，但我并不同意，”他在第二次会晤快结束时这样说，“我认为一词抵千图。图片是作为过去的信息来到我们面前的，但是，没有一幅图片可以说是我真正所爱、感到满足的，因为它总是表面的东西，缺少充足的内涵，非常肤浅，只有阅读才使你深入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书籍的力量。”

两年多一点儿以后，正在我动笔写这篇序言的那一天，消息从佛罗里达传来，同样登在《纽约时报》上，说奥托·贝特曼博士因肾功能衰竭在博卡·拉同医院逝世，享年 94 岁，还说他是“图片宝库”的创建人，“宝库的资料已渗透了美国文化”。几星期前，我们还交换过信件，相约在佛罗里达再次见面，他说将“像亲人相聚一样愉快”，令我万分欣喜。现在会见再也不可能了，但是这位文雅之士在 1996 年对我谈到巴赫，说他在混乱中建立了秩序，总是不断回归到起点，是个艺术天才……这些话永远在我心中产生共鸣。

从我的研究工作开始，我就想在爱书人、藏书地以及书籍文化的编年史发展中寻求某种延续不断的东西；历史画面当然是不停地变化的，但是它必然要回归到哲学的本原。我在十五年前就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企图记录下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占有和流传某种事物的热情：这个事物

就叫“书”；我要记录下人们怎样千方百计把我们历史、传统、文学的碎片保存下来。我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文雅的疯狂》，主要谈的是收藏图书的激情。在本书中，书被尊奉为一种象征，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 de Bury）在《书之爱》（*Philobiblon*）中称之为“思想的天赐食粮”；这本书继续研究书籍文化的综合概念，重点讲述为书籍文化献身者的经历与思想——不论他们是图书馆员、读者、作家、学者、制书人、书商、编目员、保管员、档案员，还是收藏家；讲述书籍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我考察的题目也包括“书是怎样构成的？”不论它是刻字的花岗石板，是刻上楔形文字的烘烤泥板，是纸草手卷，是棕榈叶上抄写的文字，是尖笔在羊皮纸上写的文字，是金属版面在纸上印出的文字，是激光扫描的光盘，还是把数据载入微小芯片上，再用银幕显示出来。然而我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书籍传递知识的作用上。

在大萧条最严酷的日子里，纽约市喋喋不休的市长拉瓜地亚（Fiorello La Guardia）总爱用一个激动人心的词语来结束他星期日晚间的广播讲话，为的是鼓舞听众熬过尚未见到曙光的黑夜。这位被人称为“小花”的市长常用的词语——“坚忍”与“刚毅”，确实在市民中间敲响了希望的乐音，使这两个词成为纽约市公共图书馆门前两头石狮子的非正式名称。自1911年起，这两头用田纳西粉色大理石雕成的狮子就威武地把守在第五大道图书馆的门外。不论它们是向外护卫着知识，还是向内猎取知识，在我看来，它们的形象都代表着本书的主旨。

我在旅行采访中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当我的笔记超过千页的时候，愈来愈清楚的是，我必须把这些材料写成两本书，而不是一本。因此，《坚忍与刚毅》特别关注我遇到的人物和地点，讲述其中无比有趣的故事；下一部著作《文字的辉煌：变化世界里书的永恒》（*A Splendor of Letters: The Permanence of Books in an Impermanent World*）则集中讨论有关的问题，并用故事来阐明问题。

诗人麦克利希（Archibald Macleish）担任过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1940年，在他的五年任期内，他写道：“书这个词有两层含义”，最基

本的含义是“由某种物质材料构成的”制品，然而，更重要的含义则是“一种智力的对象，由各种材料或不用任何材料构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平衡与结构存在”于人们的心中。麦克利希强调：物质的书“不过是一种巧妙的密码，通过这种密码，智力的书才能从一个人的心中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心中。智力的书永远是一种想像的结构，它一度悬浮于半牛皮装帧对开本的十分字版面之上，后来又悬浮于其他的书页和版面之上，甚至用的是其他语言”。这种想法出现在电脑这个词进入我们日常生活之前，是半个世纪前写出的，在今天却显得更加重要，它指导着我的各项研究工作。比将来的书籍形态更紧迫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保存已有的书籍。我们今天面临着挽救数百万册“易碎书籍”的艰难任务，这些书印在酸性纸上，正在加速腐朽。更艰难的问题是怎样保证电子数据资料长寿，它的产生是我们时代的奇迹，但它比印刷书更不能持久。

如果要在这些书页里遇见英雄人物，他们就是书的供应者和保管者。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说：“刚过去的不过是序曲。”这句话我曾在《文雅的疯狂》中多次使用，现在又用在《坚忍与刚毅》中。我不可能访遍自古以来地球上所有的重要藏书地点，事实上很多地方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选择几处许多世纪以来发挥关键作用的图书馆去访问致敬，讲述那里卓越人物的故事，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查阅文献资料，我在下列地点做了繁重的工作：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Boston Athenaeum），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马萨诸塞州沃瑟斯特的圣十字架学院（the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狄南德图书馆（Dinand Library），伍斯特克拉克大学戈达德图书馆（Goddard Library），还有伍斯特的美国古物学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所有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常常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珍贵宝物。我的研究工作常常得到电脑的协助，这是十年前无法享受的。虽然现代化的技术能节省大量时间，但我的讲述总是要求我见到实物和地点，要求我面对面地采访主要人物。

在我完成写作计划的亲身体验中，有一件事最能显示本书的主旨。这

件事发生在 1995 年 4 月——我可以把它描述为神灵显现。那时我正在完成《文雅的疯狂》写作中的若干悬而未决的事项。为我修改文字的编辑向我提出一堆问题，我正忙于回答，以便书能按期出版。我需要确证弗兰克·西季威克（Frank Sidgwick）所编三卷本《佩皮斯图书馆描述书目》（*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Pepys Library*）中的某一个细节，该书 1914 年出版于英格兰。我使用那套书的材料是英国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佩皮斯图书馆馆长卢凯特博士（Dr. Richard Luckett）给我的一张照片，具体说是第二卷的序言，讨论 1703 年佩皮斯遗嘱的附言，那遗嘱把历史上最不寻常的遗赠给了图书馆。我不曾读到原书，需要从书的版权页上获得更多出版的信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复杂，但是我必须核对一些事实，才能

8 把这个重要版本列入我的参考书目中。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过去从来不曾叫我失望，此后也不曾叫我失望，但他们只有佩皮斯书目 1825 年版以及 1978 年版，没有 1914 年版。我到第二个地方——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寻找，也没有好运气。失望之余，我打电话去找在英国的卢凯特博士，他又离开度假去了。最后我决定去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那是美国的卓越藏书所在地之一，著名的研究型图书馆，始建于 1807 年。

在那里，我不但在地下藏书库的一个遥远书架上找到了那套精美考究的三卷本，而且发现它还处于原始状态，书页没有裁开，经过这么多年，显然还无人阅读过。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还没有使用扫描设备来出借图书，当我在前台签名借这套书的时候，我发现书后借书卡片上是一片空白，证明它还是第一次离开图书馆。“81 年了。”我摇着头大声说，心中既感谢又觉得奇怪。办理出借手续的馆员，白发苍苍的詹姆斯·菲尼（James P. Feeney）用眼睛瞪着我，问道：“你知道他们为谁买的这套书吗？”他停顿了一下，说：“巴斯贝恩先生，是为你买的。”平静地说完以后，他又接着工作去了。

他不曾说——也用不着说的是：他的前辈把书买来以后搁置了将近一百年，为的就是将来某一天某个人也许需要读到它。幸运得很，在我之前无人借出此书，并未成为抛弃它的理由。有一阵子，许多别处的图书

馆风行缩减库存空间、紧缩经费、改订规则，这里却没有照办。仿佛有一只集体的手——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彼特拉克，罗伯特·科顿（Robert Cotton），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e of Sweden），托马斯·杰弗逊，阿瑟·阿方索·索姆贝格（Arthur Alfonso Schomburg）——每一位世界智慧的暂时保管者都伸出手来，穿过时光的激流漩涡，把这套宝贵的书送到了我的手中。这是一个实现信念的行动。我们是他们的继承人，对于第三个千禧年的读者也负有同样的责任。

9